

目 录

文 史 知 识

周恩来总理对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指示	文堂驿 (1)
邓颖超同志在全国政协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 (摘要)	文堂驿 (1)
全国政协副主席、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杨成武同志的指示	文堂驿 (3)
如何写好文史资料, 衡量文史资料的标准是什么	郝树侯 (3)

红 军 东 征

程子华同志谈红军东征	(封一)
红军东渡攻打文水城	岳寿椿 (5)
红军是仁义之师	穆照谦整理 (7)

抗 日 战 争

抗战初期三五八旅在马西一带的活动	穆照谦整理 (9)
忆西城的抗日斗争	王惺忱 (10)
真正的铜墙铁壁	陈德照 (13)
忆抗战时期的一段地下工作	赵有道讲述 穆照谦整理 (16)
智擒汉奸“三不愣”	张之蕊 (19)
张振文同志的来信	(50)

解 放 战 争

第二次解放文水城概况	刘昆瑞讲述 穆照谦记录 (20)
回顾我们的爆炸组	李世承 (22)
深入虎穴除坏蛋	赵克俊 (25)
配合主力歼敌军	赵克俊 (26)
郑家庄民兵斗争简介	穆照谦 (55)

教 育

抗战前的石侯高小	张松涛 (27)
抗日战争时期石侯高小的革命活动	林 哲 (28)
文水县立初级中学的成立	郝安仁 梁汪汶 马文堂 (31)
抗日战争后期的文水县立初级中学校	郝安仁 马文堂 (32)

文水人物

- 赵唐封同志的革命事迹.....杜修真 (34)
体育老将石铎简传.....王茂修 (35)
武有成先生简传.....薛一非 马文堂 (36)
郗理卿简传.....赵武唐 (37)
我的受业老师武梅村先生.....梁汪汉 (39)
毕生献身于教育事业的梁万协老师.....梁汪汉 (40)
温万金先生传略.....郭建民 (42)
李新同志的一封来信..... (43)
“十八罗汉”是谁?穆照谦 (封三)

三十六行

- 文水第一次体育运动会.....李绍唐 (44)
跑报子.....徐步成 (45)
文木莲花落.....韩全中 (47)
文水三弦书.....韩全中 (49)
何谓“三教九流”韩寿文 (41)
何谓“五花八门”莫平 (58)
刘彤光打门官.....文堂 穆照谦 (58)
说说解放前干鲜果行的行规.....李绍唐 (51)
“德和公”是怎样倒闭的.....李秉元讲述 穆照谦整理 (52)
我县的印刷简史.....李广智 穆照谦 (53)
张振文同志献出的医药资料..... (54)

读者来信

- 文史资料员岳寿椿同志的来信..... (38)
万年县政协文史办的来信..... (8)

编者的话

- 从编稿所想到的.....文史资料编委会 (56)

封面设计题字 蔚学高
印 刷 文水县印刷厂
出刊日期 一九八六年十月

周恩来总理对政协 文史资料工作的指示

“新的东西总是从旧根子上来的”，“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把历史割断。”，“研究文史资料要有个方向，用历史知识教育后代。”，“要存真，要实事求是”。

（摘自全国政协委员会《关于送审“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开创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的报告》）

（文堂辑）

邓颖超同志在全国政协 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摘录)

我想，我们政协的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活动性的工作。根据我们政协机构的性质，包括参加政协的单位，包括政协的几个委员会和十几个工作组，要进行协商，要开会，要讨论，要做决定。这些方面的工作是大量的。今天我们不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今天这个会议是文史资料工作的专业性会议，我仅就这个专门问题来讲一点意见。我觉得政协还有另一方面的工作，就是静的工作。文史资料工作就是属于这一类。它跟其它方面的工作在方式、方法上不完全相同。他需要坐在那个地方，动脑子，看东西，思

考、研究。所以，从形式上，从工作內容上看，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属于靜的工作。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的。但是从其效果看，它又可以发展成为活动性的工作，扩大我们的活动领域，甚至连政协各个组都可以包括到它里头去。它可以扩大统一战线的对象和统一战线的影响，发挥我们对人民、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作用。这两个方面的工作看起来是一动一靜，截然不同，但又不可截然分开。因此，我们说这两部分工作，都是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说靜的工作又可以转变成为活动性的工作呢？我们不去讲征集的时候要活动，就以扩大统一战线的联络面来说吧，文史资料工作是能夠在这方面充分发挥作用的。你们会上发的材料和第九号简报都说明了这方面的好经验。在《广东试向港澳和海外征集史料的情况和反映》这个材料中举到两个例子：一是罗翼群，一是郭典三，我们文史资料登了他们的材料，他们的后代，亲属看到后，很受感动，声言：只要祖国需要，一定回来，并且表示今后要为促使台湾回归祖国和祖国“四化”多做贡献，发扬祖辈的优良传统。通过文史资料的征集出版，使另外一些人缩小了同我们的距离，有的甚至考虑回国定居。这不是把靜的工作又变为动的工作了吗？所以，我们对文史资料工作不仅要重视它，而且要象刚才杨成武副主席说的那样来进行。他的发言，我都拥护。我只补充一点，我们文史资料工作是要埋头伏案在那儿编辑，然后付印出版，看起来好象是单纯的文字工作，其实不然，因为我们的资料拿出以后，马上就会起到活的作用。这个文字工作就跟我们统一战线的其它活动性工作一样，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工作形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看到了文史资料工作的作用和影响。再说一点，就是今

后要注意提高文史资料的质量。要广征精选，对收到的一些材料，不要因不符合我们的观点，不符合我们现在的目标，不符合我们原来的原则就轻视它。只有实行广征精选，文史资料出版的质量才能提高，它的作用也才能随之而扩大。

(文堂辑)

全国政协副主席、文史资料 研究委员会主任杨成武同志指出：

文史资料工作是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促进祖国大团结、大统一，进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并惠及后代的重要工作。

(文堂辑)

如何写好文史资料 衡量文史资料的标准是什么

文、史这两个名词，可以合成一个。古代说文史，就是指历史，也可以说文是文，史是史，两回事。也有人说，文史不分家。清朝桐城派古文家姚鼐说，写文章“要有义理，要有考据，要有辞章。”他说的义理，指的就是思想、观点、方法。我们今天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准则。他说的考据就是材料，要把材料考证真实，去伪存真。辞章就是指文章技巧。要具备这三个条件。再一个是我们历史家唐朝的刘知几，他说写

历史要具“才、学、识”。才是指文才；学就是材料，看你记的东西多不多；识就是识见，指的仍是立场、观点、方法。我们讲的把住史料关，就是“学”；把住政治关，讲立场、观点，就是说“识”；把住文字关，就是“才”。这就是说，古代人作史，和我们对文史资料的要求是一样的。把三关，精神是一致的。当然我们说的立场、观点，不是刘知几的，也不是桐城派的，也不是古代的。

写文史资料，我说应有个体裁。什么是好的文史资料，大家读的多了，就自然知道了，这非自己体会不可。按我的看法，文史资料同文艺作品不一样，不能虚构。真正好的文艺作品也很少虚构。《三国演义》是部好的小说，它所举的事实，大都是根据《三国志》和《裴松之注》来的，它是加了文学的艺术结构，当然也有一些地方有虚构。写文史资料不能写成政论、学术论文、长篇大论。我们是整理资料的，所以有我们的观点，字里行间有我们的倾向性。

文史资料是记事实，不是报纸社论，不是论文，但要有文“理”，现在叫文法，也就是我们讲的文字关。总之，我们写下的东西，第一要有说服力，要以理服人，实事求是，就是面对面，他也挑不出什么来。第二要有吸引力，要让人家从头至尾看完，或是翻了一段就放不下，这才是好文章呢。第三还要有感染力，让人看了以后起到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鼓励人们为真理而奋斗。要让他自觉地产生一个当好人恨坏人的意念。

（在省政协第一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郝树侯同志的讲话摘要）

（文堂辑）

红军东渡攻打文水城

— 为纪念红军东征五十周年而作

太原市河西区政协委员
河西中山业余学校校长 岳寿椿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九（农历二月二十六日），红军东渡攻打文水县城，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插曲，也是我省吕梁地区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只将我所亲见亲闻作一概述。

一、红军东渡前文水县的情况。

一九三五年，我十四岁，在文水县城内第一高校高一年级上学。时入深秋，朔风迎面扑来，城内政治空气日趋恐怖，城门上加强了警察的盘查守护。特别对外地来的行商小贩严密搜查，如发现身带六根火柴、一根红线的，即象征“共”字，是共产党的暗号，即行逮捕。为了加强武装力量，除县公安局充实警察和马队外，并奉令在文水启用在乡军人，成立防共保卫团一个营，营长肖成龙，下属四个连驻文庙内。为充实武器，还在公安局马号院内，雇人用铁茶壶装上炸药，在壶咀上接上导火捻，制作茶壶炮。用时在城墙上把捻子燃着，用绳子吊在城下爆炸（曾在制作时走火将岳村的旺子炸伤，此人现在马西村）。并在城墙周围每隔二百米中间，吊一盏马灯照明。又发动农民二分钱一担，将城门周围的灰渣运往远处，用这些措施以加强防守。驻扎在汾阳的阎军杨耀芳71师带着“剿匪”二字的臂章，不时地游弋在汾、文之间巡逻惊戒。

入冬以来，各村都成立了“主张公道团”，由乡绅们担任团长，配合村长组织中青年、学生、儿童上夜校，宣传“防共反共”，大唱反动歌曲，使人民对共产党视为赤化的“洪水猛兽”，吃人的“妖魔鬼怪”，在文水境内笼罩着恐怖局势。

二、瓦窑堡会议。

一九三六年，共产党为了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全国救亡运动，于元月二十六日率师由陕北东渡。当时蒋介石以“安内攘外”的政策，任命张学良为“剿匪总司令”，以东北军为主力，配合西北军，由西安北犯。同时又电令阎锡山由护路军长孙楚为前敌总指挥，派晋绥军五个旅渡河入陕北，沿河布防，南北策应，对陕北红军进行围剿，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即将爆发。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决定渡河东征的战略方针。因此组织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毛泽东主席兼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总指挥，叶剑英任总参谋长，下辖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军团长徐海东；红二十八军，政委宋任穷，军长刘志丹。三路大军共两万余人，高举抗日大旗渡河东征。

三、阎军的部署。

一九三五年冬，山西全省成立了十二个防共保卫团。分别住在河曲、兴县、离石、隰县、乡宁各县，并以驻汾阳七十一师师长为晋西警备司令。一九三六年一月，阎锡山得知红军东渡的消息，即任命三十四军军长杨爱源为总指挥，率晋绥军七师之众，以杨澄源六十九师为第一纵队，以杨效欧的六十六师附李服膺六十八师的一个旅为第二纵队，以李生达十九军的七十二师附独二旅为第三纵队，以王靖国的七十师附傅作义七十三师一个旅及独三旅为第四纵队，这些军队均附属炮兵一个团，分头进驻汾阳、灵石、蒲县、隰县一带，总指挥部设在孝义城，布下了防共的阵势。

四、红军东渡。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晚九时东渡开始。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从北起绥德、清涧百余里的黄河各渡口，用大木船、羊皮筏同时渡河，二十一日，红十五军团由辗甫渡登岸，占领石楼义牒，红一军团由坪村登岸进占三交镇（中阳）。红军突破黄河天险，兵分三路：一路沿河北上围攻柳林直捣孙楚指挥部，一路进逼中阳东进，一路猛攻石楼。二月二十三日，红军总指挥部，在石楼东辛关登陆，周恩来副主席到达中阳三交后，建立中阳县苏维埃政府，建立了红色政权。

阎锡山闻讯大为恐慌，一面急调驻陕晋军返回河东增援，一面命杨爱源率部堵击，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六日，经过中阳关上战役和隰县蓬门战役，于三月初红军开向兑九峪、阳泉曲一带。三月七日，毛主席由大麦郊出发经郭家掌于三月十日（农历二月十七日）到金斗山指挥兑九峪大战，与阎军第二纵队杨效欧展开正面战斗。随着介休、灵石李生达的第三纵队、孝义王靖国的第四纵队也兼程增援，

战斗异常激烈，显示了红军的威力。三月十三（二月二十日）红军作了新的战斗部署，分三路大军开始了新的作战行动，除一路经乡宁南下晋南，一路沿吕梁山北上晋西控制晋陕通道，红十五军团由程子华、徐海东率领，由兑九峪北上绕道汾阳城郊攻打文水、交城，直扑太原。于三月十九日（农历二月二十六日）中午，北上红军已到达汾阳演武镇一带。

五、攻打文水城。

从农历二月初，文水城内实行戒严，四门加岗，早八时开城，晚九时关城，防共保卫团肖营四个连分守四面城墙，公安局守卫着县政府，牛立胜领着商团保护商号。并动员住户南号往城墙上送稀饭烙饼。这样直接影响到我们一高学生往校上早晚自习。直到农历二月下旬情况越来越紧，四门整天关闭，内外交通几乎断绝，人心惶惶，各业停营，学校暂告停课。

农历二月二十六日的中午，农村的村民们都坐在村十字口打听动静，忽见县公安局的马队二人（侦探）骑着快马从孝义镇方向直奔县城，路过我们岳村，村民们问南面情况如何，侦察回答说：“徐海东领的红军已过汾阳演武，估计今晚就到文水县城。”（按：实际上这日上午部分红军已到我县中庄村、赤峪村一带）村民们听到消息后，比较富裕的人都跑回家中，收拾家当，闭门上关；穷人们却心若无事，仍然坐在街头，背靠院墙晒太阳。

当晚十一时左右，攻城开始，城靖周围枪声时紧时松，我们全家老小都穿上衣服紧紧围成一团，坐在炕角一边。我父亲有些胆量，好奇地爬上房顶在房脊后向北面城墙上看了一下，对我们说：“城墙周围马灯通明，手榴弹、茶壶炮的爆炸火花四溅，还听见喊口号声。”直到后半夜，

枪声停了。一会儿听见街道上有说话声、打门声，直到天明才静下来。我们开了街门，经打听得知，昨晚我北院邻居贫农家进去红军，只要的喝了点水，还动员他的三儿子李守贤参了军（此人现在东北工作，我村共有三人参军）。村民们说昨晚红军没攻下城来，今晚要继续攻城。到中午后红军撤离，阎军的几架飞机在南峪口坡上扔了几个炸弹。

据事后了解，红军攻打文水因城墙坚固未能攻下，白天把部队集中到孝义镇、马村、南峪口、土堂村，第二天攻打交城，有一个班登上了城墙，因攻城工具缺乏，又退下来。

六、红军返回陕北。

一九三六年三月下旬红军攻文水、交城时，交城已有商震三十二军的一个师先期到达防守，后中央军汤恩伯率十三军两

个师及王麟征二十五师、朱怀冰九十四师、李仙洲二十一师共五师之众，由潼关入晋，商震率三十二军两师由娘子关开进，形成对红军南北夹击之势。根据情况变更战略，由文水开栅镇进山，经娄烦、岚县到达临县白文镇同红二十五军刘志丹会师（该军是三月中旬从兴县黑峪口过河增援）后南下离石中阳，在中阳三交与陈长捷部展开激战，刘志丹为敌机关枪流弹击中壮烈牺牲。党中央为了积蓄力量，准备抗日，遂令晋南红军第十一军团撤返中阳、石楼，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一同西渡。从元月二十六日渡河东征至五月二十一日西渡返回瓦窑堡，一百一十七天（在山西境内七十五天）的东征，粉碎了蒋、阎军对陕北苏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把中国革命推向了新的高潮。

红军是仁义之师

——五位老同志回忆红军来文水

编者按：今年三月十九日，是毛主席率领红军东征，路经文水县五十周年。为此，我们收集了曹德昌等五位同志对红军来文水的回忆，在本刊发表，以纪念这一有意义的日子。

曹德昌（孝义镇，农民，六十六岁）说：红军来咱们文水县是一九三六年农历二月二十六日。当红军走后，我们这一带的人还唱：“今年二月二十六。共产党来了一不溜。”红军来的速度很快。那天清晨还听说是红军在孝义县，赶半前晌倒攻

打文水城哩。攻城不下，牺牲了几个红军，返回我村。红军是仁义之师，来了我们村不人民房，不欺负老百姓，不抢东西。在我村绑走财主武极、武培兴和武信的儿子武吉祥，他们家用钱把人赎回来。武吉祥因遭得继母，没人花钱往回赎人，就参加了红军。现在他是个大干部，不知在南方哪个省工作。

穆玉和（穆家寨，农民，六十七岁）说：红军来文水经过我们村，没有入民房，在街上墙上写了很多标语，我记得标

语有：“红军是坚决抗日的主力军！”“打倒苛捐杂税！”“打倒阎锡山，种地不纳粮！”“打倒抽丁当兵的阎锡山！”标语的落款是：“红军东征队，1936”当时听说，来文水的红军是徐海东率领的。红军从我村去了赤峪村。

赵玉（南张村，离休干部，七十岁）说：红军来文水的那一年，我在城内“聚元泰”当伙计。那一天我从北辛店要账回来，走到南关南门外五潼碑时，碰上红军过来。他们穿着杂色衣服，和老百姓说话很和气，公买公卖，不打骂人。红军里有不少十几岁的孩子。拿的武器也不齐整，有红缨枪、大砍刀。有的提个铁桶桶，里面放的红颜料，在墙上写标语。红军攻不下文水城，就进了开栅口子，把那里的地主们搞了一下子。

成效德（南峪口，农民，七十五岁）说：我今年七十五岁，红军来文水那年我才二十五岁，至今整五十年了。红军是从灵石来的，路经汾阳演武村到了文水。当时文水城内卫队的樊金康等几个便衣出了城，往南面侦探红军，走到上贤他们就见对面来了红军，吓得他们就把家伙（枪）寄放到上贤卡子上，往回走，赶到文水城时，四门都已封闭，城上的人用绳子把他们吊了上去。红军的路线是：走孝义镇，入窊头沟，过土塔村，到泉泉寺。结果引

道儿的人因口音不同，引上去了甘泉寺，红军到寺里一看，是一些念经的和尚。他们打开地图一看，才知走错了路。就又从赤峪村经孝子渠来了我村。有些人见红军来了，开腿就跑，红军就喊话说：“不要跑，是自己的人！”人们也就不跑了。红军穿得杂色衣服，头上戴得用蒿草制的防空帽，飞机一来，他们就圪就下了。红军在我村，没有欺负老百姓。临走时将我村财主武德喜绑走，后来武从天齐店偷跑回来。红军从我村去了泉泉寺。那一天下午红军攻了一下文水城，第二天就进了开栅口子走了。

张生（孝子渠，离休干部，六十八岁）说：一九三六年农历二月二十六日，红军从汾阳县罗城一带来的文水，因去泉泉寺误到赤峪甘泉寺，从赤峪村来了我村，在村外河滩里给村里百姓们开了会，红军给我们讲：阎锡山说我们“杀人如割草”，可我们一个人也没杀。我们是为抗日来的。为了抗日，有钱的出点钱，有粮的出点粮，……。在会上看到我村武三赖、武丑四穿得衣服烂缕，红军给了他俩每人一匹白布、八元白洋。正在开会时，阎锡山的飞机来扔下炸弹，炸伤一名红军，抬到南峪口村，就牺牲了。后来因没攻下文水，就进开栅口子走了。

（穆照谦收集整理）

（来） （函）

（照） （登）

文水县政协文史办：

承蒙你们寄赠《文水文史资料》第三辑（1986），谢谢。

该辑所载武静山委员写的《中药材炮制法》，内容很好，不少同志看了甚感兴趣。故去信请你们再给我们一份，不知是

否有存书，如需工本费，我们将如数汇上。

顺致
撰安

江西省万年县政协文史办

一九八六年九月四日

抗战初期三五八旅 在马西一带的活动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打进娘子关，同年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国民党川军、陕军、南军撤退下来路经文水走后，日军继续南侵，占居交城县。就在此时，在文水马西、神堂、赤峪、孝子聚、中庄一带，驻扎下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的一个营，积极发动群众进行抗日。

营部驻扎马西村，营长姓彭，指导员谢鉴亭带领陈守忠、董忠义、白吉华、李树庆等五人为一组，驻神堂村，活动于赤峪、孝子聚一带；队长蔡日轩带领穆玉林、陷定山等三人为一组，驻中庄村，活动于孝义镇一带。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扩充队伍。

这支队伍绝大多数是二十多岁的南方人，据他们自己说，就是一九三六年曾经“东征”的红军。该军纪律严明，除驻地外不入民宅，公买公卖。一九三八年元旦，驻中庄的蔡队长向赤峪村为新兵要了一口猪，送猪的老乡放下猪就走，蔡队长又将老乡叫回，老乡有些恐惧，不知为什么叫回他，结果是给了他四元白洋作为猪价。老乡到街上高兴地说：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要来的东西还给钱呢？特别有意思的是，这年“冬至”中庄穆宅在祠堂挂出“神则”后，穆玉林到里边还叩了个头，说：“这就是我的祖先”。

该部驻扎以后，经过充分发动，扎实的工作，很快扩充新兵三百余名，分马

西、神堂、中庄（后移至孝义镇）三村驻扎，所驻村庄插着红旗，每日训练新兵，唱着“义勇军，真英勇，结了团体打日本……”的抗日歌曲。他们统一起灶吃饭，给新兵们三日一只羊，五日一口猪的优待，粮食除由各村摊派外，对一些富户进行合理负担。如赤峪村就合理负担过于执珍、于开茂、于应全三家洋布二十匹、小麦二十石。那时的口号是：为了抗日，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有人的出人。

在这期间，该部不断派出侦察队前往交城县境内侦察敌情。有一次九名侦察员出发从洪相、安定一带抓回两个佩带“欢迎日本大皇军万岁”袖章的日伪维持会的人，一个认罪态度好，经教育释放；一个态度生硬，顽固不化，被杀死在马西村东。

同时他们向群众积极宣传抗日，在马西街上书写了“打倒杀人放火的日本鬼！”“铲除认贼作父的卖国贼！”等标语。一九三八年元旦期间，在马西村南门戏台上演出抗日内容的“文明戏”。他们还做知识分子的工作，马东村张锦刚在赤峪村当教员，经常和该部董忠义、白吉华接触，受到革命教育，后来部队走后，他回村当了村长，积极进行抗日工作，被日军抓到汾阳仁岩村杀死，就义时高呼：共产党万岁！

部队住了一个多月，到一九三八年一月间，部队临走时，孝义镇村长张东俊出

忆西城的抗日斗争

王惺忱

西城村是位于文水县城东北二十华里的大村子。土地肥沃，水利条件很好；人民群众勤劳朴实，憨厚善良。然而，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后，在日伪的残酷统治下，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终年勤劳，不得温饱。每年劳动所获，大都被日伪政府“布施”而去，一年四季起码要起八次“布施”。如果谁家不交，送到城里坐牢。一九四三年村长王贤卿给大汉奸文丕承小孩过“满月”，一次就花大洋两千元，西城村每人平均五角。日伪便衣

汉奸，不断来村里敲诈勒索。如大汉奸阎光明的便衣龙狗三，来村里吃了太谷饼怕压住火，还要吃牛黄清心丸。村里拿出“厚生”烟，他不吃，说是“驴粪蛋”，非要吃“金葫芦”、“麦秋”烟不可。有一次他在街上看见二喜观老汉拿的一个绿翡翠玉咀旱烟袋，便叫住问：“你拿的什么？”“旱烟袋”“哪儿来的？”“买的”。“放屁！是八路的！”二喜观见话茬不对，急忙改口说：“不是，是我拾的，老总，送给你吧！”龙狗三笑着说：

面阻拦，不让带走新兵。他的理由是“你们原来说扩兵是为了保护地方，你们要带新兵走，就将我杀死。”所以孝义镇一带扩起的一百多名新兵未走。马西村扩起的一百多名新兵，听说要到外地，也都逃跑掉。只有神堂扩起的一百零八名新兵，编入六团，开赴抗日前线。现知其名者有：神堂村的任增福（现在太原建筑工程队，十四级干部，已离休）、贺兔儿（抗日战争中牺牲）、梁成则（失踪）、任润根（抗日战争中牺牲）、李春贵（抗日战争中牺牲）、任四则（抗日战争中牺牲）、翟世有（已故）、任培梅（已故）、任培生（已故）、任荣耀（已故）、任连登、任世录、任海山、翟银则、任效谦、任秃则（失踪），赤峪村的于源（现在兰州汽车制造厂，曾任厂党委书记，已离休）、于万生、于世元、于富吉、于贵则、李斗威、于善礼（已故），孝子渠的张月、于有福（已

故）、武金维（已故）、郭德才（已故）、于学富，马东村的曹敏（现在上海工作）张××（抗日战争中牺牲，其父张泰）等三十人。其余不知其名，同时，在这些新兵中也有汾阳人。

这支部队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农历腊月二十九）由开栅口子进山后，曾在交城火山与日军作战一次，神堂村贺兔儿就是这次作战中牺牲的。后来部队开到晋北，收复失地神池、五寨、岢岚三县。据张月说：指导员谢鉴亭在朔县马鞍山与日军作战中，头部负重伤，双目被毁，转到后方，再没见到。据穆万海说：蔡日轩后任一二〇师特务团的一名指导员，百团大战中在宁武县牺牲。据于万生、张月说：后来，该部由晋北转战于河北省。

（于敬、于万生、任世晶、张立、张月、张生、李秉元、刘昆瑞、穆万海、穆玉和等供情况，穆照谦收集整理）

“这还差不多。”便吧老汉的玉咀子拿走了。当时人们出门不敢骑车，不然碰上伪军们也得被抓走。就是鞋也不敢穿新的，不然遇上汉奸也要脱去。由于人们过的这种痛苦生活，便骂开了阎锡山：“大讨债，二讨债，阎锡山，良心坏，养的军队不抗日，叫咱们活成这时代。”

然而，西城人民对于日伪的残酷统治，并没有屈服。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

抗战初期西城村就有妇会的吕雪梅、青会秦承德、工会段海青等领导群众对敌斗争；还有一二〇师的王大流（王立元）工卫旅二十二团的白锦章、文水县抗日政府的李生华、周文炳、赵唐封、八分区的李光清、刘芳等领导人民搞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以及献金活动等；教育科的张松涛、武银仙等搞宣传教育工作，教群众唱革命歌曲。当时在西城村，上自县领导李奎年，下至二大队的石尚英、曹立谋、穆生金、二木虎等，经常在西城发动群众给我抗日政府送公粮、送布匹、送硫磺。因此人们称西城村是“毛斯克瓦”（即莫斯科）。

我党在西城不仅公开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而且还建立了秘密的地下情报网。我原系东北哈尔滨海拉尔市的印刷工人，一九四二年冬回到西城后，在地下党员阎四牛的介绍下，参加了八分区敌工科的地下交运站当交通员，阎四牛的化名是“柳树田”，我的化名是“海沈英”。当时我们的领导人是王水，直接领导我们的是周惠民（周是武陵人，一九四七年牺牲在太原）。那时我有一张伪满州国海拉尔国境警察队发的上有照片打着钢印的特别“身份证”，我带着这个“身份证”无论到哪儿，敌人一看，就毫不怀疑地放行。我们还争取了日军司令部翻译蔚子祥

（他娶的是西城的女人）。蔚被争取过来后，曾在文水放过被敌人抓捕的我南贤村地下党员狗狗、县林业局长张守汉、武工队的狗则、阎三则等。他还给我发了个“通译联络通行证”。有了这些条件，我们就和交城一区的任井夫、魏一平（康明）挂钩，沿线联络了西石侯武三牛、杭城二牛、成儿、武良马二则、东城二壮则、李成栋、东庄卯根则、永乐二有光、王致贵、旧城张玉金、十中则，宁二青等，形成了一条护送干部的交通线和情报网。所护送的干部大部是外地人或刚下山的同志。其中如独一旅的彭绍武，青救会的秦承德，统购站的胡玉祺等同志，都经我们护送过。所送情报是区里的开会通知或公粮交款等遇知。区干部下不来山时，就由我们代收。待区干部下来后清交他们。

但是，斗争又不是一帆风顺的。自王宪卿当了村长后，村里就大大不安了，日伪突击队经常来西城活动。有一天南头高明宗家院内住下我二大队的人，敌人摸黑便来了西城村。在这紧急关头，阎四牛叫我和蔚永康在大城南村边扔了颗手榴弹，才把敌人引开。后经查证落实，才知是王宪卿密报的。经请示县抗日政府批准，由麻石柱等把这个坐地汉奸提出来，镇压在村南白家十字路口，并贴了布告。

镇压王宪卿后，敌人更把西城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大汉奸宋于英和阎锡山洪先队的孟玉林及两个徐沟的土匪来了西城，要捉阎四牛。他们到了阎四牛家，把阎的母亲打得头破血流。并且住了下来，声言非捉住阎四牛不走。在此情况下，我方区长贾石亭同志说：“好嘛，咱们就关住庙门啃骨头，看谁吃掉谁？”于是便安排了公人高猪儿，用吃肉喝酒的办法把敌人稳住，贾石亭扮成端菜的，成儿扮成筛

酒的，区警卫员办成打杂的。四个家伙喝的乐不开交、酩酊大醉之时，贾区长的手枪顶住宋子英的背心，阎四牛拿着纸烟也走进来说：“阎四牛来了！”大家一齐动手缴了他们的枪，把他们五花大绑起来，对这种铁杆汉奸不属争取教育对象，经县委批准，把这四个匪特绑到西营圪口镇压。这一行动便镇住西营的便衣“二凶犯”、“白眼五”、“红毛二青”等，再也不敢来西城活动了。

西城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抗日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也付出了代价。遭受了日伪屠杀的“四·一一”惨案，其大体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四五年春，日军为了“强化治安”，做最后挣扎，从临汾调特别警备队（宪兵队）到文水，妄图对文水抗日军民施行镇压。四月十一日，天还没有大亮，从文水城内来了两个汉奸便衣带着一伙日军进了西城村公所。村公所的公人王文杰（已死）根据敌人写的名单上有“四牛”二字，便让另一个人带上敌人到李四牛的家，把李四牛（外号叫圪干四）捆起来带出村外，两小时后大批的日伪军开来，将西城村团团围住，强令公人鸣锣，集中村民到“多宝寺”（当时的村公所）开会。在寺前有个穿着兰色便衣的鬼子，对手无寸铁的村民一个一个的相面，把他认为有怀疑的，都给脸上划上个圆圈或打上个把叉，村公所柱子上，一边贴着“四牛”，一边贴着“成成”，台上站着伪军头头和伪警察官吕跃望，还有人们最痛恨的便衣特务文建国，文还扯着高嗓门喊着，让群众交出四牛和成成。这时，西城村的伪情报员李××（外号捣鬼三），跟着日军直打转，乞求他们放了李四牛，并说李四牛是他的亲兄弟。敌人便召集了几个小

孩，指着李四牛问孩子：“他叫什么名字？”孩子们回答说圪干四。日军笑了笑又把“捣鬼三”和李四牛带上往北面走。不一会儿，敌人把李四牛松绑后带了回来，后面又带着两个女人，一个是李四牛的媳妇，一个是李四牛的母亲（即“捣鬼三”的叔伯弟媳和亲婶子），过了一会儿敌人又从北面捆来了两男两女，群众一看便认出这四个人都是老老实实的庄稼人，一对是石太仁夫妇，另一对是石太清夫妇，押着的伪军还拿来一大堆衣服。日军队长对着伪村长王国瑞问道：他们是什么人？王说都是好老百姓。这时便衣特务文建国和日军都喊着：八格（日语，意即混蛋），几枪托子把王打倒在地。日军又喊叫了几声，只听见磅礴叭叭拉枪栓的声音，突然又传出一声“哎呀老天！”的尖叫声，会场此时鸦雀无声，只看见有六个人死在敌人的刺刀下（死者为李四牛的母亲、妻子、石太清夫妇和石太仁夫妇六人）。这时伪警察吕跃望还讲话说，死了的也就死了，谁也不用瞎嚷嚷，谁说对谁没利。就这样敌人撤退了，村民们回家一看，家里东西也被日伪军抢劫一空。

原来日军得到汉奸便衣特务的密报，说西城有个“四牛”是八路，并提供了“四牛”住家门口的特征等。四月十一日，日伪军进入西城，按名单上的“四牛”字样，就把李四牛误认为阎四牛，而这两家家门口都有棵槐树，阎四牛的父亲叫阎二秃，李四牛的父亲叫秃子，就这样，敌人就以残暴的手段乱杀了人。至于石太清和石太仁两夫妇的死，是伪警察想敲诈他们家的财物曾遭到反对，日伪人员便怀恨在心，这天来故意把一个手榴弹放在石家的风箱内，借搜查之便发现，受到栽赃陷害。

真正的铜墙铁壁

——忆云周西村的抗日斗争

离休干部 陈德照

我是云周西村人，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次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大象镇农会指导员、云周西村副村长、党小组长、党支部书记。在那个艰苦斗争的日子里，云周西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为保护我党抗日干部做出了很大贡献，有的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就从日军七次包围云周西的事实完全说明，他们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云周西无愧于“小延安”之称。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文水有一二〇师、三支队活动。一九三八年四月，文水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顾永田，秘书彭敏。同年八月成立中共文水县委，县委书记陈郁华（对外不公开），当时名声较大的是以大队长名义出面的王金荣以及李贯山等，他们常在云周西发动群众，宣传群众，进行抗日斗争。这年八月间，我参加了县干训队学习，担任了大象镇农会指导员，不久就担任了云周西村副村长。村长李英宗，叫他专门应付日军。任副村长的还有刘树旺、孟喜和、石世芳。

我们执掌村政权之后，坚定不移地执行党和政府的抗日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和发放流通券。群众可以用流通券买东西、回赎土地、归还债务，它的作用很大，威信很高。群众说：“顾县长真能干，政府发放流通券，修渠打坝都能

花，买卖粮食也能用，发展生产有办法。”由于我们执行了抗日政策，生产大有发展，群众的革命觉悟大有提高，全村有二十多名青年参加了抗日队伍。在云周西村军民团结，群情激昂，抗日歌声嘹亮，积极支援八路军打仗，配合政府除奸，踊跃向我政府所在地送粮、送布、送棉花。

一九三九年七月我入了党，任党小组长，党员有刘根生、石五则（解放战争时期叛党，被我方镇压）。这一年，县委书记赵克林，组织部长殷裕，宣传部长李大忠，抗联主任陈华，妇女主任黄波，区委书记韩汝范等，常在云周西活动。

一九四〇年，我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这年秋，县抗联主任陈华叫我到北齐村酒坊负责，刘钟秀当大掌柜，我当二掌柜。实际以开酒坊为名，建立我方党的联络站是实。下曲镇地下党员唐墉同志用自行车带上两篓酒做掩护搞工作，到哪里也方便。联络站的任务是保存干部，侦察敌情，发展党的力量，建立党在农村的基地。这个联络站也确实保存了我党的抗日干部。如一九四〇年腊月二十三日，“清山”的日军对平川进行扫荡到北齐村，我们将县公安局审讯股长李珠、侦察股长郭世明化装成酒坊工人，没有出事。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日伪军连续七次包围云周

西村，企图抓捕我抗日干部。但在群众的掩护下，都是敌人兴冲冲而来，灰溜溜而去。

日军第一次包围云山西

一九四〇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日，日军对云山西包围。当时村里住着县抗联主任陈华，区委书记韩汝范、区里的四扣则，二十二团的侦察员以及工作团的人员。特别是陈华同志正患伤寒病，无法转移，在石三槐家养病。日伪军已进了院时，他身边还放着一本《论持久战》，陈德林立即把这本书装在身上。伪军进了陈华住的家，问石三槐女人道：“这是谁”？她说：“是我大伯子，害伤寒病”。伪军们怕传染，就走出去，正碰上两个日军往进走，伪军们对日军说了几句日语，日军就没进来。陈华同志才没出事。其他同志在群众掩护下，安全转移。

日军第二次包围云山西

一九四一年农历正月，信贤村、下曲镇驻下日军。有一天由日军山田队长带领日伪军百余人包围了云山西。那天村里住的县委书记赵克林、县抗联主任陈华、县妇女主任黄波、区委书记韩汝范、区长张有义、公安局局长李珠、郭世明、区上的四扣则以及工卫旅的侦察员等。敌人一到村，就叫村公人敲锣，要人们到庙上开会，每户只许留一人看门，如查出两人就按八路处理。针对这种情形，我们支部发动群众，对我方人员作了安排。首先安置外地人。因李珠是外地口音，也没“良民证”，就叫他到磨坊磨面。让刘胡兰借了个“良民证”给赵克林，叫他到我们的小铺“同心成”当商人。叫郭世明赶上羊群出了村。韩汝范提上箩头去“拾粪”。黄波借了件花花衣服穿去到庙“开会”，我也去到会场。

群众在庙上到齐后，会开始了。日军队长通过翻译对大家说：“谁家住的八路军，赶快交出来，如果被查出，把你们都杀光，把房子烧光”。群众回答说：“我们村没有八路军”！翻译又说：“太君知道你村住的很多八路……”群众异口同声道：“没有”！这可气坏了敌人，他们气急败坏地说：“这村的人真坏，明知住的八路，就是不说……”。但他们怎么咋唬，群众总是个“没有”。敌人无可奈何，只好宣布散会。

敌人走后，我们支部对形势作了分析，他们这次来一无所获，是决不会甘心的，我们要做充分准备，有些外地干部转移他村。以防敌人的突然袭击。

日军第三次包围云山西

日军第二次包围云山西走后不几天，有保贤村便衣正儿（外号拐胳膊）引上日伪军来云山西抓人。他们这次来主要是抓我和韩汝范。他们说：“只要抓住陈德照、韩汝范，就能知道县委书记赵克林和抗联主任陈华在哪里”。

这一天我在北齐村酒坊。拐胳膊到了我家，问我妈：“你儿哪里去了？”我妈说：“他不在，我不知他去哪儿了。”败人就打我妈，她始终也没说。败人无奈，就气狠狠地走去。当时韩汝范正在黄莲则家。敌人从我家走后，我妈就不顾一切跑到黄莲则家给韩汝范报了信，韩急忙转移到王正高家。敌人去了黄莲则家，打得她要韩汝范，但她一口咬定“不知道”。后来敌人把她打了个半死，但硬骨头的黄莲则也未吐真情，敌人只好扫兴而去。

日军第四次包围云山西

信贤村住下日军后，向各村要情报员。我们就选拔了一个十分可靠能给我方搞情报的石居山，给信贤据点送“情报”，

以合法身份出入于日军据点，为我们了解敌情。

一九四一年夏，环境开始恶化，我们活动也极为困难。农历七月十五日中午，敌人来了。刘胡兰气喘呼呼地跑来我家告说：“鬼子来了，在十字街，你快快躲开。”她又问“咱们的人还有谁在？”我告诉她：“区长张有义在东头石秀文家。”她说“你快走，我去告张区长吧。”胡兰子走后，我就走到对门卯生婶家，她叫我到茅房装便。不一会儿敌人就到了我家，打的我妈要我，我妈说“不在，不知道。”一会儿敌人又来了卯生婶家，汉奸们又问她：“陈德照在你家不在？你住不住八路？”她说：“我家只有一间房子，还能住下他们？”敌人问了一会就走了。当时我很担心张有义同志。过了一会儿，卯生婶出去探听消息回来说：“张有义和石秀文两人相跟上，拿着泥瓦匠工具，装作上坟修墓碑出村走了。敌人又扑了空。

敌人没抓住我们，就把他们的恶气刹在送“情报”的石居山身上。第二天石居山去信贤据点送情报，敌人就打他。说：“你们村常住八路，你连个确实情报也送不来？”居山临危不惧，申辩道：“我村没八路，你们不相信。有人胡说有八路，你们就相信。你们去了捉不住，就打我，我有什么办法呀？”说得汉奸们没说得了，就把他撵了出来。

日军第五次包围云周西

一九四一年秋的一天，敌人第五次来村捉八路。当时在平川活动的同志不多了，经常在云周西的有韩汝范，张有义、陈华、赵克林、范铭等。这天只有张有义在我村。敌人来时，张有义正在村书记员（会计）段开基家，敌人进段院后，段开基的

女人就把张垒到被子垛里。敌人进屋后，问有没有八路，段妻说：“没有”。敌人看了看再无别人，就走了。他们哪知被垛里藏着一位“八路”呢？

日军第六次包围云周西

信贤村的日伪军几次来云周西没抓到一个八路，死不甘心。他们凶神恶煞地于一九四一年冬的一天，牵着洋狗又来到云周西，到李玉芳家，要她交出区委书记韩汝范，她说不知道，敌人就打她。敌人怎么打她，她也不说。后来敌人把李玉芳的衣服剥掉，和洋狗放到一个家，洋狗把李玉芳咬得浑身是血，她始终是“不知道！”敌人毫无办法，只好偃旗息鼓，滚了回去。

日军第七次包围云周西

日伪一次又一次包围云周西，没抓到一个八路。于是他们就改变了花招。一九四三年春的一天，敌便衣伪装成我八路军来村，公人石居山误以八路军接待了他，他探明韩汝范在村，而且知道韩是木匠出身。所以第二天一早，城内日军宪兵队和汉奸们就来了云周西，把所有的木匠铺和接近八路军的人家都包围了。

但是敌人没有抓到我们。因为前一天晚上，我和韩汝范在西头“同义魁”小铺和开小铺的陈兰亭、石启华闲谈到午夜，就住在小铺内。第二天早上约六点钟，胡牛儿在后窗上告诉了我们敌人包围的情况。我俩趁街上没敌人，就提上箩头、扛上铣出了村。

敌人没抓到我们，就打村长张德芝、书记员段开基，特别把石居山吊了起来，进行毒打，问他要八路，但他始终不讲。敌人就把他三人和一个教员带进城，对石居山用尽了刑法，但他宁死不屈，为了革命壮烈牺牲。其余的人经花重钱赎回来，